

【文化观】

文天祥起解汝阳道

□蔺时工

楼船载国的南宋丞相文天祥(1236—1283),要论气节,任谁都佩服。

祥兴元年,文天祥在五坡岭战败被俘。押至元大都(当今的北京城),羁系囚禁三年,屡经多方威逼利诱,依然铮铮铁骨誓死不屈。至元十九年十二月(1283年1月),文天祥从容就戮,终年四十七岁。绝笔曰: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惟其义尽,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?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!”元世祖闻其遗言,感叹不已:“好男子,不为吾用,杀之诚可惜也。”后来明廷追赐谥号“忠烈”。

至元十六年(1279)九月初九,在“寥廓江天万里霜”的重阳佳节,被押解北上的文天祥,从微山湖之南的徐州,踏上了齐鲁大地,沿大汶河行走。沿途看到的不是重阳节人们遍插茱萸、登高望远的升平气象,而是水深火热的民生情景,从而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篇和孤忠者的凛然正气。这首《过汶河》,写于重阳节前日:中原方万里,明日是重阳。桑枣人家近,蓬蒿客路长。引弓虚射雁,失马为寻獐。见说今年旱,青青麦又秧。

那时的文天祥虽是“罪囚”之身,行走蓬蒿客路,亲近桑枣人家,关心的还是民胞物与,百姓生计。虚弓射雁、失马寻獐,彰显的是仁人之心:听闻今年天旱,庆幸并未“农废汶阳耕”,田地里播下的冬小麦,已经绿油油遍地茁壮了。这或许能带给他一丝慰藉。

亦步亦趋,五天之后的九月十四日,文天祥馆于汝阳驿。其《汝阳道中》当写于此时:积雨不肯霁,行陆如涉川。青毡犹我后,白毡覆我前。我欲正衣冠,两手如纠缠。飞沫流被面,代我泣滋涟。鸿雁纷南翔,游子北入燕。平楚渺四极,雪风迷远天。昔闻济上军,又说汝阳田。我今履其地,吊古怆苍烟。男儿欲了事,长虹射寒泉。

连天霖雨不见晴日,走路如同涉水趟河。青毡贴在身后,白毡覆盖在身前。欲正衣冠,双手不听使唤。飞雨洒面,像替我哭泣山河破碎。鸿雁迁徙南飞,游子北上幽燕,四极远天,渺然平阔。早就听说济南郡、汝阳田,如今在这里兀自吊古伤今。然而,最遗憾的莫过于血性男儿的未竟事业,如长虹透射寒泉一样凛然逼人。显而易见,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徒唤奈何?豪杰的末路悲歌,令人潸然……

不过,可以告慰这位民族英雄含笑九泉的是,此后汝阳田民众传奇式的抗元斗争。汝阳田上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故事:元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,每十户人家派驻一个“家鞑”。除了横征暴敛不说,平时大姑娘小媳妇为了免除他的骚扰,还要向他支付“门槛费”……汝阳田人不堪忍受,纷纷密谋抗元。朱元璋欲联合民众共同举义,但元统治者搜查严密,苦于无从传递消息。所以刘伯温便出锦囊妙计,命王昭光制造月饼,将写有起义信号的纸条藏入月饼内,再分头把这些月饼分发到汝阳田及各地起义军中。八月十五中秋节,月白风清,汝阳田人闻风而动,抄起锄镰镢锨,反抗压迫……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《过零丁洋》诗格与人格,浑然一体。情调高昂,热血贲张。遥想当年,就连宋恭帝赵显和太后被俘之后也来劝说文天祥一同投降,他依旧坚持浩然正气,没有变节屈膝,依旧坚持抗元,这是初心、信仰和气节与所体现的捍卫正义、宁死不屈的精神。文天祥汝阳道中的两首诗歌,似乎是这个命题的注脚。泰山岩岩,汶水汤汤。文山之风,山高水长!



【短史记】

石上书魂: 镌刻在岩壁上的长歌

□张勇

“尕日塘秦刻石”,是我国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。

其实,中国大地的深山河谷中,隐匿着无数沉默的史官——它们乃天然岩石,却因古人之手而获得生命。这些石刻遗迹非仅冰冷石头,实为文明与时间的角力场,是文字挣脱简牍束缚,向历史深空发出的宣言。当易朽的竹简帛书在历史长河中消散,石刻以倔强之姿守护着记忆,使千年之后的人们仍能触摸那些早已逝去的时光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天下,命人刻石记功。这些矗立于东海之滨的巍峨石刻,不仅承载着帝王的雄心,更标志着石刻作为一种权威历史记录形式的正式登场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详尽收录这些碑文,使后人得以窥见那个开创性时代的宏大气象。尤为珍贵的是《泰山刻石》,虽然原石残损,仅存数字,但通过史书保存的文本,我们仍能感受到李斯小篆那“画如铁石,字若飞动”的艺术魅力,见证着文字统一后的规范形态。

两汉时期,石刻文化渐趋繁荣。陕西汉中博物馆珍藏的《石门十三品》,堪称石刻艺术史上的奇迹。这些镌刻在褒斜道石门内外的摩崖石刻,记录了一条古栈道的兴废变迁。其中《鄧君开通褒斜道碑》详细记载了汉中太守鄧君率领民众开凿栈道的艰辛过程,其笔力遒劲,结体宽博,已然脱尽秦篆遗风,展现出汉代书法特有的恢宏气度。这些刻石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,更是一份详实的工程技术档案,让后人得以窥见古代交通建设的真实状况。

魏晋南北朝虽政局动荡,却为石刻艺术提供了特殊的发展契机。北朝摩崖刻经规模空前,如泰山经石峪的《金刚经》石刻,字大如斗,气势磅礴,被誉为“大字鼻祖”。僧人安道壹等人在山崖上镌刻佛经,既为弘扬佛法,亦暗含“缣帛易销,金石难灭”的保存理念。

唐代国力强盛,石刻文化达至巅峰。唐太宗痴迷王羲之书法,命冯承素等摹写《兰亭序》。宋代根据唐摹本刻制的定武兰亭石刻,成为后人窥探书圣风采的重要媒介。这

种“以石传书”的模式,使许多珍贵墨迹通过刻石得以间接保存。唐代碑刻精品辈出,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、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、柳公权《玄秘塔碑》等,皆成为后世书学者必临的经典范本。这些碑石不仅是艺术珍品,更构成一部立体的书法史,记录着楷书走向完全成熟的辉煌历程。

宋代以降,石刻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。宋人好古敏求,兴起了金石学研究热潮。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开金石学专著之先河,赵明诚《金石录》更成集大成之作。这些学者遍访名碑,拓印考释,使石刻研究从单纯的书法临摹升华到系统的学术领域。苏轼、黄庭坚等文人书家也积极参与碑刻创作,将他们即兴挥毫的诗文刻石传世,如苏轼《丰乐亭记》、黄庭坚《七佛偈》等,皆属文人石刻的典范之作。

特别值得玩味的是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石刻逸事。镇江焦山《瘗鹤铭》,其书法奇崛纵逸,宋代黄庭坚称之为“大字无过瘗鹤铭”。相传此为书圣王羲之所书,然考证应为南朝隐士所刻。该刻石原位于长江中,只有在冬季水位下降时才偶露真容,文人雅士常乘小舟前往观摩拓印,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。唐代诗人李白在《蜀道难》中惊叹的“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,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”,或许正是面对金牛道旁摩崖石刻时的真实感受。

这些古代石刻之所以珍贵,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,更在于它们承载的多元历史信息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孙膑兵法》竹简虽为战国兵学瑰宝,然若非汉代石刻中已有相关记载,此失传古籍的确认将困难重重。石刻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,为我们拼接历史碎片提供了关键线索。从秦岭古道的开凿纪事,到边塞关隘的巡守记录——石刻以最持久的方式保存了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
这些沉默的石头见证着中国人对永恒的独特理解:通过文化的传承实现精神的不朽。古代文人深知竹帛易朽,唯有金石能够抗衡时间的侵蚀。他们将思想与情感镌刻于山岩,使自然物质转化为文化载体,创造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方式。

【阅书所得】

《红楼梦》里螃蟹宴

□王玉美

暮秋时节,金风送爽,桂子飘香,《红楼梦》中那场闻名遐迩的螃蟹宴,便在这样诗意的时节里徐徐铺展。当藕香榭的水榭里飘起蟹的鲜香,当姑娘们的诗笺上落下与蟹相关的词句,这场宴席便成了《红楼梦》中最鲜活的秋日印记。

螃蟹宴的缘起,带着几分随性与惬意。第三十八回中,因天气晴暖,贾母兴致大发,念着“那山坡下两棵桂花开得正好,河里的水又清”,便提议在藕香榭设宴赏桂吃蟹。这提议一说,众人皆喜。凤姐最是麻利,立刻吩咐下去:“我和你们说,别高兴太早了,小心冻着。那螃蟹,今年就比往年的好,我已预备下了。”寥寥数语,既透着对众人的关切,也显露出她持家的周到。为了这场宴饮,府里上下忙碌起来:小丫头们提着小竹篮,将鲜活的螃蟹从后厨送到藕香榭;婆子们在水榭里摆开桌椅,桌上备好姜醋、热酒与各色点心;连平日里娇生惯养的姑娘们,也按捺不住兴奋,早早地梳妆打扮,盼着这场秋日雅聚。

藕香榭的景致,为螃蟹宴添了不少韵味。这水榭“四面有窗,左右有回廊,亦是跨水接岸,后面又有曲折竹桥”,坐在里面,既能望见“河里的水又清,满眼的荷叶莲蓬”,又能闻到山坡上桂花的甜香。宴席开始前,宝玉带着黛玉、宝钗等人先在榭中赏景,只见“池中莲藕新残相间,红绿离披”,秋风拂过,荷叶沙沙作响,桂花瓣儿随风飘落,有的落在水面,有的落在桌案旁,连空气里都满是秋日的清甜。这样的景致,让原本寻常的吃蟹,多了几分诗意与雅致,仿佛不是在贾府的园子里,而是在江南水乡的画舫中。

宴席一开,众人便抛开了平日里的规矩与拘谨,尽显随性与自在。这场螃蟹宴,最妙的莫过于“食蟹”与“赋诗”的结合。酒过三巡,蟹过五味,湘云提议以螃蟹为题作诗,众人纷纷响应。黛玉才思敏捷,提笔便写下“铁甲长戈死未忘,堆盘色相喜先尝。螯封嫩玉双双满,壳凸红脂块块香”的诗句,将蟹的形态与滋味写得生动传神。宝钗则另辟蹊径,写下“桂霭桐阴坐举觞,长安涎口盼重阳。眼前道路无经纬,皮里春秋空黑黄”,看似咏蟹,实则暗含讽喻,引得众人连连称赞。宝玉虽不擅长作诗,却也凑趣写了一首,虽不及黛玉、宝钗的精妙,却也透着几分天真烂漫。姑娘们的诗句,或咏蟹之形,或赞蟹之味,或借蟹抒怀,让螃蟹宴不再只是单纯的口腹之欲,更成了一场充满文人雅趣的文化盛会。

这场螃蟹宴,是《红楼梦》中难得的轻松时刻,可热闹背后,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隐忧。凤姐布菜时,丫头来报贾赦请宝玉明日请安,暗示着家族内部的复杂关系;黛玉的体弱、湘云的寄人篱下,也让这场欢乐多了几分淡淡的哀愁。就像秋日的阳光,虽温暖明媚,却也预示着寒冬的临近。